

**全民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国务院发布暂行条例**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日电 国务院新近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

国务院发布这个暂行条例是为了发展和完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

这个暂行条例对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内容和形式、承包经营合同、承包经营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企业经营者的产生和考核、奖惩等作出了具体规定。《暂行条例》共七章四十五条。(全文见二版)

# 新《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公布

收有常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

## 城市电影院趋向多功能

北铁分局用经济手段压缩开支  
**购置高档消费品要交纳附加费**  
去年起收取汽车等占用费行之有效

# 我国食物发展的战略和途径


(一) 将种植业由二元结构转变为三元结构, 逐步建立专业化的饲料产业

目前, 我国居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从膳食构成和营养状况看, 热量已满足需要, 而蛋白质不足; 粮食消费量大, 而豆类和其他植物蛋白产品甚少。今后,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对肉、蛋、奶等动物食品的需求将不断增长。为适应这一形势, 必须解决转化动物食品所需要的大量饲料 (尤其是蛋白质饲料) 问题。因此, 人们讨论的粮食问题实质上是饲料粮问题。据预测, 到2000年我国饲料粮150亿公斤以上。为解决这一迫切问题, 要确立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的三元结构, 种植高蛋白质饲料玉米和蛋白质作物3亿亩。例如, 紫花苜蓿干物质含粗蛋白4.7%, 所含蛋白质是小麦的2倍。紫花苜蓿

### (三) 建设高营养、低质的现代饲料工业体系，提高科学饲养水平

根据畜禽营养需要和饲料营养价值制定不同畜禽、不同日龄的饲料配方，在此基础上由工业生产的配合饲料，是提高科学饲养的一个关键基础和物质基础。可以说，没有现代的饲料工业，就没有有科学化、高营养的畜牧业。目前，我国粮食一方面短缺，另一方面由于与畜禽相抵触，配合饲料造成巨大浪费。生产1公斤猪肉一般需2—3—4公斤粮食。而使用配合饲料喂猪，不仅可节约粮食约2—3—5公斤，每头还可节省劳力30—60公斤，按3头计共可节省150—300亿公斤，其效益和节省力十分可观。因此，我们建设，现在就要像重视化肥生产那样，抓紧配合饲料工业的建设，实行大中型相结合，以中小型为主，坚持质量第一，普遍建立饲料企业监测机构，加强质量管理，以使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饲料工业及其服务体系。

送往迎来，鞠躬作揖，就等交诰，耽误多少工作，浪费多少时间？“拜年”的很累，被“拜年”的也很累，大家“过年”如“过关”不是说过“过年”不吃该吃喝点，更不是说过“过年”不该探亲访友，而是说希望今后“过年”，真正轻轻松松过几天，而年前年后则要集中精力工作。



农业生产是植物利用太阳能,把来自土壤的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物质和能量转化过程,同时又是人类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在我国,每年大约有一—5亿吨产品取自农业。因此,必须要有相应的物质投入才能进行正常的农业物质循环。同样,在工业之间也存在密切的有机、互相依存的产品和物质转化过程。目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 $\frac{1}{3}$ 。这些物质消耗,要通过工业提供化肥、农药、动力燃料等才能来自农业以补偿。如果工业关系处置不当,取之于农业而不能来补,那么工农业之间正常的物质循环就要受到破坏。

## 广 开 门 路 挖 掘 潜 力

(一) 将种植业由二元结构转变为三元结构, 逐步建立农业的饲料产业

目前, 我国居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从膳食构成和营养状况看, 热量已满足需要, 而蛋白质不足; 粮食消费量大而豆类 and 动物食品不足。今后,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肉、对、蛋、奶等动物食品的需求将不断增长。为适应新形势, 必须解决转化动物食品所需的大量饲料(尤其是非粮饲料)问题。因此, 人们讨论的粮食问题实质上是饲料粮问题。据预测, 到2000年约需饲料粮1500亿公斤以上。为解决这一约, 要建广开畜牧业——经济作物——饲料作物的三元结构, 扩大高蛋白饲料玉米和豆科作物3/2亩。例如, 紫花苜蓿干物质是小麦的4.7倍, 所含蛋白质是小麦的2倍。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大型画册《周恩来的青年时代》出版

恩来如何孜孜以求、探索救国道路；在经过艰苦探求，长期锻炼，反复比较之后，终于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并从此为实现自己的信仰而奋斗终生。

画册共分中学时代、留学日本、五四运动、旅居欧洲和深切关怀、深切怀念五部分。画册中有首次发表的周恩来的照片40余幅。

由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辑的这本画册，收入了有关周恩来的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照片180余幅，辅以较为详细的文字说明和大事年表，着重介绍了青年时代的周

我研制成新材料超导体  
转变温度迄今世界最高

有关专家指出,这种新的不含稀土的超导材料,性能稳定,工艺可以重复。

外交部发言人说

## 对巴尔干国家外长会议 中国政府给予积极评价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国对巴尔干国家关系史上第一次外长会议最后在贝尔格莱德顺利召开表示祝贺, 并给予积极的评价。

这位发言人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巴尔干属于巴尔干各民族，巴尔干的问题应由巴尔干各国人民自己来解决。对于一切有益于巴尔干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建议和活动，我们都支持。


发言人说，我们深信，这次巴尔干国家外长会议取得的积极成果必将有助于推动巴尔干国家发展多边与双边合作，有利于加强巴尔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年

过春节又叫“过年”。有些机关平时松松垮垮,“过年”更垮垮松松。“年”未到,早就在那里过年了;“年”已过,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过年,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不知可否叫做过年的“超前”和“滞后”。

不是吗？一进腊月，有些机关就动了起来，忙忙碌碌办年货，东奔西跑送年礼，还提前好几天，甚至十几天开茶话会，“拜早年”。过了年，据报道，直到农历正月初八，西安、咸阳、长安等地许多机关还在“过年”，有的干部在办公室下象棋、打扑克，有的用瓜子、糖果消磨时光。不少办公室房门紧锁，前来办事者叫苦不迭。据说，有的地方不过十五不上班。

送往迎来，鞠躬作揖，觥筹交错，取  
误多少工作，浪费多少时间？“拜年”的很累，被“拜  
年”的也很累，大家“过年”如“过  
关”，不是说“过年”不该吃吃喝点，  
更不是说“过年”不该探亲访友，而  
是说希望今后“过年”，真正轻轻松  
松过它几天，而年前年后则要集中  
精力工作。



(下转第三版)

“顾惠东效应”分析

顾惠东，一个文弱的工程师，在南京纺织机械厂欠债达191万元、濒临倒闭时挺身而出，在公开招标中一举中标，出任厂长。承包11个月后，该厂总产值近300万元，利润28万元。

顾惠东成了南京的新闻人物，有人说他“有能耐，有办法”，也有人骂他是“不管工人死活的资本家”，要他“快走早好”。一个厂长的作为，竟然引起如此强烈的多重社会心理波澜，我们姑且称之为“顾惠东效应”，并试着做些分析。

种种心理分析

在企业濒于破产时，人们已麻木了，习惯了，谁也不去深究。为什么在顾惠东承包取得显著效益之后，却众声大哗，逆反心理强烈？这里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涵。

心理冲突——主人身份与租赁承包。在某厂对租赁承包者的严格考评会上，一位老工人当场呜呜地哭了起来，震惊全场。记者围了上去，以为他为此个改革之举所感动，便请他发表讲话。他坦城地掏出了心里话：“我们在厂里干了几十年，搞了多少年社会主义，没想到今天竟把工厂卖掉了！”一些人总以租赁承包是“出卖”企业给私人，租赁承包者是“老板”，故心存疑虑、隔阂和成见。一些人之所以一肚子怨气，感到有屈主人身份，就是误认为自己干活是为“老板”赚钱的。

一些人做惯了“大锅饭”的主人，对租赁承包责任的转变不适应，他们注重从概念上、心理上，而不是从企业经营、财税贡献、民主参政方面去做企业的真正主人。

心理反差——“大锅饭”的温情与承包制的峻厉。关于“顾厂长不关心工人，对资本家还狠”的反映，主要集中在两点上：劳保用品和扣病假工资。

一些人从前任厂领导流露出几分怀念，他们毫不掩饰地对记者说：“以前厂都可好了，防脱油、雪花膏还是照发，这就可以看出老领导心里有我们工人。”那本企业也买了一台机床才发出工资，这本本企业耻辱，领导失败的标记。可是它至今仍引起一些人怀念：“老领导真关心我们工人啊！”

顾惠东后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我把那些给每人发一份防脱油、雪花膏的钱，用到奖励对企业作出贡献者，改“大锅饭”为奖励机制。

对扣病假工资反应强烈的人，最有力的根据是“文革”前劳保条例对8年工龄以上的老工人病假半年内不扣工资的规定。可是，“文革”以来出现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情况：真、假病假分不清，连没病的健康人也可以拿到病休半个月的医生证明。

顾惠东死后，作出新的规定：请病假者一律扣工资，依据工龄长短每天扣0.5元至1.5元不等。对于真正因病请了较多工资的工人，则由车间工人给予补助。

在小件车间门口，记者与一群工人交谈、对话。记者认为，没有参加生产的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客观上是没有贡献的，

特色：真、假病假分不清，连没病的健康人也可以拿到病休半个月的医生证明。

顾惠东死后，作出新的规定：请病假者一律扣工资，依据工龄长短每天扣0.5元至1.5元不等。对于真正因病请了较多工资的工人，则由车间工人给予补助。

在小件车间门口，记者与一群工人交谈、对话。记者认为，没有参加生产的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客观上是没有贡献的，

一个工厂连年亏损，无人动心，一位工程师承包一年，扭转亏损局面，并按合同应发奖励，于是全厂大呼，你道怪也不怪？

细想一下，也不怪。改革不是仅要砍掉福利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办法，也必然要触动在旧体制下形成的那些心理状态。从这个角度看，“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也就是必然的了。

决不可轻视和忽视某些心理状态对改革形成的阻力。一些改革措施所以不能贯彻下去，有些单位的改革所以走了曲折的路，常常就是那些不适应改革的心理状态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在我们推进改革的时候，一定要花气力琢磨一下这个问题。

决策者、经营者，一定要考虑到改革中的各种心理因素，要估计到某些改革措施将会在各种人群中引起的各种心理反应，并把“心理对策”作为改革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加于研究。

主管单位、领导者的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当着对别人一讲引起纷争的时候，要细心想一下，这里面包含着怎样的心理因素？

每个干部、每个职工是否也有必要冷静地琢磨一下自己对某件事物的心理反应呢？赞成、为的什么？反对、依据什么？把某件事物放到是否有利改革的天平上称一称，许多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所以，我们提倡大家都从积极的角度来琢磨一下改革心理。

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发展和完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原则下，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经营权关系，使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制度。

第三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必须兼顾国家、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利益，调动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积极性，挖掘企业内部潜力，确保上交国家利润，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逐步改善职工生活。

第四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应当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切实落实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按照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确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第六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双方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接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七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国家审计机关及其委托的其他审计组织对合同双方及企业经营者进行审计。

第二章 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内容和形式

第八条 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主要内容是：包上交国家利润，包完成技术改造任务，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

在上述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不同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其它承包内容。

第九条 承包上交国家利润的形式有：

（一）上交利润递增包干；

（二）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

（三）微利企业上交利润定额包干；

（四）亏损企业减亏（或补贴）包干；

（五）国家批准的其他形式。

第十条 上交利润基数一般以上年上交的利润额（实行第二步利改税的企业，是指按缴纳税所得税、调拨税部分，下同）为准。

受客观因素影响，利润变化较大的企业，可以承包前二至三年上交利润的平均数为基数。

确定上交利润基数时，可参照本地区、本行业平均资金利润率进行适当调整。

上交利润递增率或超收分成比例，应当根据企业的生产增长潜力并适当考虑企业的技术改造任务确定。

第十一条 上交利润的方式：企业按照税法纳税，纳税额中超过承包经营合同规定的上交利润额多交的部分，由财政部门按季返还80%给企业，年终结算，多退少补，保证政策。

第十二条 技术改造任务，应当根据国家的企业产业政策、市场需求、技术改造规划和企业的技术经济状况确定。

第十三条 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其具体形式，

金融市场发育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广州“民间银行”生机勃勃

11家城市信用社已吸引闲散资金7000多万，放贷5000多万

本报讯 据羊城晚报报道：被人称为“民间银行”的广州市信用合作社在改革中发生生机，逐步成为全市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补充力量。

目前广州市“民间银行”有11家，一年多来，这批“民间银行”已吸引了社会闲散资金7000多万元，为320多个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5000多万元，还为其他银行拆出资金400万元。

近年来，广州集体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很大发展，商品流通渠道不断扩大。由于国营银行忙于与大中型企业开展存贷业务，因而对“民间银行”和个体工商户业务往往无暇顾及。对于集体企业就是在这形势下应运而生，从前年10月起陆续创办起来的。它属集体所有制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间金融机构，根据“以存定贷、多存多贷、资金自求平衡”的原则，主要办理城市集体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存款、贷款和结算、汇兑等业务。在市、区、街道党政部门和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支持下，目前正朝着巩固、提高的健康方向发展。

广州市“民间银行”的出现，为缓解某些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资金短缺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荔湾区的安发玩具厂与港商签订200万元补偿贸易合同后，购买生产设备急需资金，金花街信用社就主动贷款11万元给该厂，使该厂及时购置生产设备，顺利投产。今年春节前夕，河南省某行商向清平桥社区购销部提供鸡心枣1.75万公斤，该购销部因流动资金不足而无法付款，后来从清平街信用社贷到1.5万元，顺利地做成了这笔生意。南海西

陈慕华在全国农行分行行长的会议上提出

陈慕华在全国农行分行行长的会议上提出，要讲清楚的是事业，不是金钱，这体现出他崇高的精神境界、美好的情操与品质。但是另一方面，是否也是面对着当前仍十分强大而顽固的旧传统观念，不得不作出的妥协性、自我保护性的迁就呢？

中国人有一个奇妙的传统心态：个人利益最少，人格形象最大，一旦你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哪怕是个人获得微利，你的人格便立即受损。假如顾惠东承包失败，按照承包合同便倾家荡产，甚至坐牢，人们可能会说：“这是应该的，合同书上的白纸黑字写着么！”但是，现在是顾惠东成功了，他若按照合同领取应得的那份报酬，那么他日后必将陷入窘境，步履维艰。

阻挠因素——“利益差异”从工资发不出，到每月几元工资，个人收益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然而一些人心思盘算着：辛辛苦苦地干，拿的是“零头”，他顾惠东一下子就是上万元。甚至有人还振振有词：“厂里经济效益好了，就是我们工人干出来的！你顾惠东本事大，还是我们养活了。”

他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只有生产产品、“硬件”的体力劳动，才能创造财富，而把技术、决策、管理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起来，并把对企业主导作用的“软件”劳动成分排斥在价值创造之外。实际上，在企业家和工人构成有机体的企业里，他们是互相依存、共同创造新世界的两个整体。

据报因素——“中间障碍倾斜”应该承认，纺织厂的广大中层干部、职能部门是与新厂长同心同德，同内共济的，发挥了较好但是，某些内在因素又造成了“心理落差”——

“你”厂长干两年就走，我在这个企业也是要呆一辈子的。我们在中间障碍里，对上下哪头也不敢得罪啊。”

“得罪谁厂长只是两年的事，得罪工人，那就是‘一辈子啊’！一个企业整体，上下两头之间，中层的传递、粘接作用，开始出现了缝隙、偏移……

实行企业的租赁承包，打破“大锅饭”，打破了一个旧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也打破了原有的一个稳态心理系统；另一种亚稳态心理机制随着改革的理论渗透进来。如何进一步改革，改革社会心态，则是改革的一个严峻课题。

（原载《科技日报》本报作了删改）

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实行全行业承包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实行全行业承包，今天在北京举行签字仪式，同所属施工企业签订了“四包一挂”的承包经营合同。四包是：包上交所得税额、包上交利润、包固定资产增值、包国家流动资金完整。一挂是工资总额同产值利润率、工程质量优良率、设备完好率和安全生产挂钩。

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贵阳海关正式开关

贵阳海关批准设立的贵阳海关，二月一日正式开关。贵阳海关批准设立的贵阳海关，二月一日正式开关。贵阳海关批准设立的贵阳海关，二月一日正式开关。

台湾拟放宽大陆棉花和焦炭间接进口

据台当局《中央社》报道，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委员会”日前向立法院提出建议，在现已允许第三地棉花间接进口的情况下，再扩大进口大陆棉花和焦炭。台当局原规定，大陆货品不论直接或间接都不准运入台湾，但属一产地的棉花、焦炭，则通过转口输入。去年台当局曾一度开放棉花、茶籽饼、玉米、高粱、小麦、毛鸡、松毛虫等二十九项大陆产品的接运进口。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发布）

第六章 承包经营企业的管理

第三十四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实行资金分帐制度，划分国家资金和企业资金，分别核算。

承包前企业占有的全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列为国家资金。

承包期间的留利，以及用留利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和补充的流动资金，列为企业资金。

承包期间用贷款形成的固定资产，用留利还贷的，列入企业资金；税前还贷的，按承包前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折算成国家资金和企业资金。

承包期间所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基金，按固定资产中国家资金和企业资金的比例，分别列为国家资金和企业资金。企业资金属企业所有制性质。

第三十五条 企业资金作为承包经营企业盈亏的风险基金，承包期满后转入下期承包的企业资金。

企业完不成上交利润，先用企业当年留利抵充。不足时，用企业资金抵充。

第三十六条 承包经营企业必须合理核定利润下的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分配比例，并提取一定比例的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用于住房制度改革。承包后新增的留利应当主要作为生产发展基金。

第三十七条 实行承包前的贷款，由国家承担的部分，要在承包经营合同中规定还款额度和期限，分年还清，然后按规定调整承包基数。实行承包后的贷款，原则上要用企业资金偿还。

第三十八条 承包经营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物价政策，不得擅自涨价或变相涨价。企业发生价格违法行为时，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企业和企业经营者的责任。

第三十九条 承包经营企业应当搞好企业内部领导制度改革，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第四十条 承包经营企业应当加强民主管理，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切实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

第四十一条 承包经营企业应当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和健全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搞好企业内部承包。

第四十二条 承包经营企业应当严格按照资产责任制，确定适合企业的工资形式和分配办法，积极推行计件工资制和定额工资制，使职工的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紧密挂钩。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交通、建筑、农林、物资、商业、外贸行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实行行业包干的部门和计划单列的企业集团的承包，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不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起施行。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敬爱的周总理以他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无私地贡献了一生。他的不朽业绩和卓越功勋，将永远铭刻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我有幸青年时代就结识他，以后，我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和在国务院工作，又都在他直接领导下，由于他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创建和发展，为全国民族工作的开展，为各民族干部的成长格外关心，更由于他平易近人，待人以诚，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敬爱可敬可亲之感。在纪念周恩来同志90周年之际，他的很多往事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把一些印象最深的写出来，作为对敬爱的周总理的纪念。

民族干部的知心人

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是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我在中山大学作教学翻译工作。周恩来同志是乘到莫斯科参加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之便，到学校来看我们的。1928年，是蒋、汪叛变，大革命失败的第二年，全国到处都是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我们在莫斯科，欢呼过革命军北伐的胜利，也声讨过蒋、汪叛变，大革命失败了，今后怎么办？不少人忧心忡忡，大家关心中国今后的命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周恩来同志又来看我们，我们自然心情很激动。周恩来同志和我们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关心地询问那。他需要地给我们讲六大精神和国内形势，问过了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后，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希望我们学成回国为我国革命贡献力量。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是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在交谈中，有人告诉我，我和一个同志是蒙古族，他的目光马上集中到了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身上，并带着微笑说：“噢！你们是蒙古族，好极了！好极了！”这样格外关注，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有点拘谨，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过后我们都为没能给周恩来同志多说几句话而无不感到后悔。周恩来同志与我们交谈时的深沉目光和亲切关注，长久地回荡在我心底深处。我想，周恩来同志为什么对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那么关注？很显然还是把我们看作是少数民族的代表，着眼于整个蒙古族乃至全国各族人民。他的关注，饱含着对我们的无限希望。此后，我经过反复思考，萌发出了请求回国，投身到国内艰苦而又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的想法。经过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意，1929年我回到国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辟和坚持地下斗争，后来又开展了建立蒙古族武装的斗争。

时隔14年，也就是1942年，在延安又同周恩来同志见面了。这时，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周恩来同志是从重庆回延安来参加整风的。这次相见同第一次见面时比较，14年的艰苦岁月，使周恩来同志看上去老了一些，但他炯炯有神的双眼显得更加深沉，明快而有吸引力的谈话，表现出了随着阅历的加深，他更富有经验，更成熟了。见面后他就说：“云泽同志，你的情况王若飞已经给我讲过，我都知道了。”又说：“你回国后，在延安地区做群众工作，培养干部队伍，还搞了百灵庙斗争和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斗争中培养出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干得很好嘛！”我说：“这些事都是按照党的指示做的，特别是王若飞同志在延安（内蒙古西部地区）期间，代表中央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多重要指导和具体指导，过去工作中取得的这些成绩，是蒙、汉族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同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后来周恩来同志又说：“赢得抗战胜利还要进行艰苦斗争，中华民族在危难中，我们肩上的任务更重了，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在谈话中，周恩来同志提到一些内蒙古地区的人物，而且对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基本情况都很了解。这说明周恩来同志很关心少数民族工作，很注意研究内蒙古的问题。

回想起来，周恩来同志对我一直是非常关心的。早年的不必说，仅就50年代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他总促我发表意见，并很重视我的意见，就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记得1957年在青岛开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时，他已全面透彻地讲了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我不准备再讲什么了，可是他一定要我再讲一讲。于是我就讲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几个关键问题。还有一次是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问题时，周恩来同志从历史到现实，从全国到广西，作了人情入理，令人信服的话，可是他还是要我再讲一讲。在他的促使下，我就按照中央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集中讲了把原广西省的行政区域全部划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周恩来同志对我两次发言都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所以能成为人民做某些事，都是党培养的结果，这当中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是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感动，终生难忘。“文化大革命”中，我长期被“监护”，1973年党的十大大召开前，经过周恩来同志多方努力，解除了对我的“监护”，恢复了自由，让我回到了北京。事后我了解到，周恩来同志为了让我参加十大并选为十届中委，曾据理力争，纠正和批判了说我是“反党叛国”、“搞分裂”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他特意把1945年10月中央派我去苏尼特右旗解放那里搞起的一个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说成是“单刀赴会”。并说：“在抗日斗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他敢于只带几个人去搞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了不起的事。”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周恩来同志是冒着很大风险伸张正义的。“四人帮”还给我强加了“反党叛国”的罪名，本欲置我于死地。如果不是周恩来同志的保护，还不知身何处呢。更谈不上重新出山工作了。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我，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这是对于一个民族干部的信心和爱护，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同志坚持党的原则，无私无畏、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德。每想到这件事，我们都感到周总理有一种无法报答的

为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呕心沥血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乌兰夫



周恩来同志和少数民族青年在一起。 本报记者摄

感激之情。周恩来同志对我的这种关心和爱护，远远超出了我个人，而是对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的关心和爱护。

执行民族政策的楷模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基本政策是经过长时期探索、酝酿确立的。我党充分考虑了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特点，深刻分析了我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感情上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在近代革命中，中华各民族为反对共同敌人，更是团结一致，生死与共，各自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实际情况，从既维护国家的统一又让少数民族在各自地区当家做主出发，英明地提出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中，周恩来同志是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是党的这一基本政策的第一次实践，而1947年3月25日中央批准建立内蒙古自治区的电报指示，正是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央集体决定精神亲自起草的。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我国大部分地区尚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内蒙古也只是解放了东部大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确立和实施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扩大解放区、加强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了我们党的政治远见，和革命胆识。而周恩来同志起草的中央电报指示，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电文中，除表示同意建立内蒙古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外，并明确指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并非独立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它所反对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独裁政府，及其取消民族自治权利的伪宪法和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同时，对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党的工作、政权建设、军事斗争，以及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其它问题，都做了明确指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这一电报指示精神，制定了自治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它不仅为解决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革命发展中间解决全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取得了经验。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同志亲自起草的这一电报指示，为后来不断充实完善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同志被誉为这一基本政策的奠基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周恩来同志一向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划定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时，他的作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947年5月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时，虽然中央对其辖区已有益的设想，但那时我们只控制着内蒙古东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客观上还不可能形成真正完整的内蒙古自治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内蒙古地区陆续解放，明确内蒙古行政区域的问题就提到了日程上。早在1949年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党中央就议定了这个问题。当时，周恩来同志曾把我整理的内蒙古基本情况的材料批发给与会同志。毛主席提出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逐步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的统一。自治区领导机关由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待绥远解放后移归绥。按照毛主席这一意图，中央确定了内蒙古的行政区域。这一意图的含义很明确，就是撤销察、热、绥三省，形成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以彻底改变国民党反动派及历代统治者对内蒙古实行分裂统治的状况。这样既符合内蒙古的历史情况，也符合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和汉族有关各族的利益，深受广大民族和其他各族人民拥护。但是，当时也有少数人不理解，以种种借口拖延这

一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同志深知各族人民的心情，坚定地贯彻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意图，并为贯彻实施这一意图，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毛主席，一见面他就问我，你搬家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搬。毛主席听到奇怪地说：“怎么！你还住在张家口？”我说还有人不理解，需再做工作。毛主席对此非常坚定。我也把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说：这个问题是中央已经定了的，毛主席也说过，按中央定的，毛主席说的办，我再做思想工作。经过周恩来同志多次耐心的谈话，做通了有关同志的工作，这个问题才得到了圆满解决。1952年夏天，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由张家口迁到了归绥（呼和浩特）。后来又又在周恩来同志的关心和主持下，经过几次区划调整，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域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做到了毛主席说的“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十年浩劫中，林彪和“四人帮”倒行逆施，把一个好端端的自治区划了个七零八落，破坏已经恢复的“本来面貌”。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要我就此给中央写了个专题报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中，“本来面貌”又恢复。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不单是区划问题，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为全国各少数民族所注目，其影响远超过了内蒙古自治区。

周恩来同志重视民族工作，认真执行坚决捍卫党的民族政策的典型事例很多。在这无数事例中，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这就是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根本不顾民族工作，把中央一级所有民族工作机构都一扫而光。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大量有关民族工作的问题无人过问，长期下去是很危险的。周恩来同志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虽然他已病入膏肓，但决心不下。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他经过多方面考虑，下决心提出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一个民族政策研究小组，并明确提出“组长必须乌兰夫同志当”。这个研究小组建立后，我当然不能事负他对我个人的关心和信任，要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当时我在内这个组只有7个人，虽然那时“四人帮”在台上，我们的工作很艰难。但是，毕竟有了一个民族工作的机构，不管它怎样，这方面的事情是有地方管了，而更重要的是它以后可以逐步恢复民族工作机构，正常开展民族工作创造条件。后来中央任命我为中央统战部部长，我就把这个组的同志带到了中央统战部，使得我的民族工作得以继续进行。成立全国人大常委民族政策研究小组，是周恩来同志为我国民族工作尽的最后一点力。这最后一把力，谁知道周恩来同志花费的气力要比正常情况下大出多少倍呀！更何况这是他的最后时刻！这件事办过后没有多久，周恩来同志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我向他的遗体告别时，回忆着这件事，回忆着他关心民族工作的无数事例，不禁默默地落下了。

为少数民族发展呕心沥血

旧中国各少数民族都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过着穷苦落后的生活。内蒙古的情况也不例外，特别是居住在广大牧区的蒙古族，经济、文化水平低，疾病流行，人口下降，生活极为悲惨。解放后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在内蒙古牧区提出了“人畜两旺”的口号。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中央和全国各省市给予了有力支持和全面支持。这种支持和支援正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过问、直接主持下进行的。现在内蒙古的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历史上的悲惨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

周恩来同志为此付出的心血却永远留在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记忆中。

50年代初，为了解除内蒙古牧区群众的病痛，制止人口下降，开展过一场消灭梅毒病的驱梅斗争。那时候国家还很困难，为了支援驱梅，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从中央和一些省、市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组成驱梅队派往内蒙古牧区，同时还调进了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保证驱梅需要。在中央和有关省、市支援下，

经过驱梅队医务人员艰苦奋战，内蒙古牧区的梅毒病很快得到控制，仅短短几年就把给牧区群众造成灾难，危及蒙古族民族生存的梅毒消灭了。这一给内蒙古草原和整个蒙古族带来欢乐和幸福胜利，内蒙古人都知道，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关心和指挥下取得的。

3年困难时期，全国食品缺乏，大家都在为如何渡过困难积极想办法。1959年底，我在北京开会遇到了康克清同志，她对我说，上海和华东其他几个城市有些孤儿，由于食品不足很难办，问我能不能想办法帮助一下。我说：“可以。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那些孩子送到内蒙古。送奶，是解决孩子们多少时间的问题呢？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给牧民抚养。牧民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再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孩子的问题，可说是两全其美。康大姐，你看怎么样？”康克清同志觉得给牧民抚养的办法好，当即表示赞成。后来周恩来同志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年年初她问起了我，我把与康克清同志商量的意见和内蒙古接收、安排的设想及准备情况给她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很高兴，他说：“这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小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牧区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以后建设是有好处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但要注重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交给谁，交给谁抚养，一定要安排好，并保证他们吃得胖胖的，长得壮壮的。”为了接收和安排这批南方孩子，我们成立了以自治区卫生厅厅长为首的专业机构，抽调了一批医护人员和保育人员，负责孩子们的医疗保育工作。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抱。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红绿绿的脸蛋，更加讨人喜欢。阿爸们、阿妈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照料。在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有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







